

# 以独特视角讲述当代的中国故事

□汪守德

察与解剖的一个具体的焦点和标本,作品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从开始时的盲目无序所造成的灾难,使之成为一种毒瘤一般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存在,详尽分析与寻找城市病的成因与诱因;到作为参与其中的生活者、建设者、管理者,上下一心、行之有效的科学治理的过程;面对积重难返的现状,既考验着政府的决心、决策与决定,也考验着与之息息相关的每一个人,这其中体制优势、行政管理、人心向好的特点,在此都充分地显现了出来。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出,其既不回避现实问题,又写出了人们为解决问题与矛盾所付诸的行动,让人看到的是认清现实后的理性,以及解决问题、实现理想的希望。这一过程既是艰难的,也是激动人心的。因此《家园》这部作品虽然讲的是深圳,也同样适用于所有中国城市的观察与思考,具有普遍的借鉴作用,具有特别警醒的意义。

杨黎光让我们进一步思索的是,在较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做着城市梦,城市梦也许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梦与城市病相伴而生,如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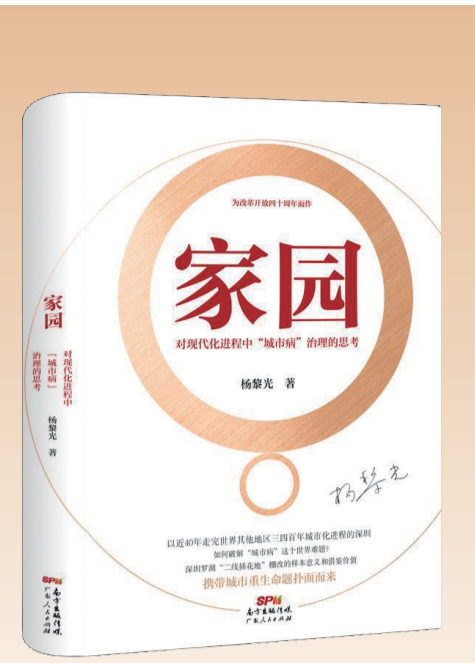
它的阳光与病痛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即现代化以其发展的加速度,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与便利,同时也使城市与人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即随着城市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进步,它也变得越来越脆弱,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呈现为一种病态。治理好这种沉痾日久、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使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保持健康良好、安全有序的状态,并且真正惠及后世子孙,既是为过去眼中只顾发展、不计后果的盲目还债,也是一种尤为急迫的现实,更是面向未来的重大课题。

深圳作为杨黎光深入解剖的基点,也是他观察的原点和起点。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宏观与微观的视角,他并不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深圳乃至当代中国,而是从历史、现实与未来,古今中外的多种维度上,进行跨地域、跨学科的立体思考。在全球发展大潮流之下的中国不是孤立的存在,所有世界其他异国城市在发展进程中遭遇的问题,都有其同性的特征,值得后发的中国城市去借鉴。作家在行文中列举的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美国底特律等发达国家的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的发展经历,及其遭遇的环境灾难与

困境,都可成为我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寻找启示的生动例证。这或许能够告诫人们,在昂首前行的路上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生活了26年的杨黎光,显然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和真情,富于深刻独到、清晰真切的感觉和思考。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写好这本大书,在深入扎根于深圳生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面积的现场采访和资料搜集,为写作积累了十分翔实的素材,竭力以精确的数据与无可否认的事实,来以小见大、由此及彼地表达其观点。然而其写作又并不仅仅是事件的堆砌,而是极为讲究谋篇布局的,情真意切的书写,为此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心血。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把人在当代城市的核心位置来观照与思考,体现出深厚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其中有大量的细节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如对鹰的重生、凤凰涅槃等的描写,达到思想性、文学性和可读性的相互融合,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因此可以认为,杨黎光的《家园》可谓境界高、视野广和接地气,散发出前瞻、求实和理性的光芒,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份优秀的样本,是值得高度肯定和赞扬的。



## · 评论 ·

### 创作谈

2018年9月,写完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最后一章的时候,有点筋疲力尽的我,不禁在书中写下如此感慨:“站在一片瓦砾地上的我,回想着自己这20个月来深入其间的过程。为了写好这本书,在沈阳冒着风雪,在北京顶着严寒,在包头深入风沙,在杭州感受着骄阳,在上海目睹百年里弄的沧桑,在罗湖桥头追寻着近代中国的脚印。于是,我记录,我思考,我分析,我归纳,一个字一个字从我手下流出,然后一章一章累积成书。此时,有那么一种东西触动着我的内心,报告文学的创作总是在抵达现场,深入接触世间的种种变化,观察着岁月匆匆地流逝。报告文学作家也在一字一字,一章一章,一本一书的写作中,渐渐地老去,留下的是一个记录世界变化的文本。”

其实这次写作并不止是20个月,它开始于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开始采访创作“追寻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脚印”系列,到改革开放40周年时结束,整整10年。10年中,我先后写了《大国商帮》《中山路》《横琴》,到今天这最后一部《家园》,总共4部。10年,真是一个不短的岁月,此刻的我望着窗外,岁月匆匆流过。

进而,我又想到,自1992年南下深圳,至此已经在这个改革开放前沿工作了26年。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作家,在这26年间,记录了这个时代的变迁,也对时代的进程有着良多的体会。26年来,我的笔触进入了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巨变,也观察到它在前进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 《家园》:城市空间更新的文学标本

□杨晓升

杨黎光是位十分勤奋、创作卓越的报告文学作家,也是一位具有思辨能力的报告文学作家。自2008年以来,他着力于“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长篇思辨体报告文学系列的创作,此前已经完成《大国商帮》《中山路》和《横琴》3部,他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是他这一系列报告文学创作中的又一次尝试。杨黎光说,原本他并未计划写这部作品,是罗湖区委宣传部的游说、尤其是罗湖区“二线插花地”火热的建设场面和众多感人事迹深深打动了它。

杨黎光先前的几部思辨体作品,我并未读过,读他的这部新作《家园》,我感觉这是一部视野开阔、大信息量、扎实厚重的报告文学力作。正像杨黎光自己所追求的那样,强烈的思辨色彩,是《家园》凸现的主要特色。旁征博引和夹叙夹议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思辨色彩,同时拓展了作品内容的广度、厚度和深度。

写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的棚户区改造,从治理“城市病”说开去,将其放在世界城市发展史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考察,作者大量引用古今中外城市化建设及建设理想宜居城市的有关家理论,对“二线插花地”棚户区的改造的必要性、愿景和路径设计进行全方位的考察论证。

“二线插花地”棚户区的改造到底有多难?专家们异口同声——难,太难了。无论是改造标的的体量,还是产权复杂的程度,即使不能说绝对不可能完成,但难度却是前所未有的。为此,专家们甚至还有了“三个前所未有”的看法:“二线插花地”改造范围之大——前所未有;建筑体量之大——前所未有;复杂程度之大——前所未有。据说,这些身经百战

的外地“棚改”专家们,临走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是“中国棚改第一难”。

然而,深圳的执政者和建设者,却知难而上,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务实创新的精神攻坚克难,硬是将22处“插花地”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的脏乱区域和城市安全隐患改造成新悦目的城市宜居家园,并由此总结出“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工作的经验。罗湖区委书记贺海涛在开会发言中对罗湖推进棚改的方法作了如下概括:按照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穷尽法律、严守底线的原则,经过全面摸底调查和反复研讨论证,探索形成了适用罗湖的棚改模式及政策标准,充分体现了公共安全至上、公共利益优先、寻找最大公约数的发展理念和创新发展精神。还提炼出罗湖棚改精神:敢担当,善作为,讲奉献,论实绩。毫无疑问,罗湖的棚改经验和棚改精神,在全国理当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数十年城市化进程和旧城改造中,拆迁是所有城市建设中无法绕开的难题,而强拆一直是诸多社会矛盾中的焦点。以往的社会舆论,无论什么情况,也不追究何种原因,都更多地站在被拆迁群众的立场上,甚至将政府拆迁人员视为侵害群众利益的反面群体。迄今为止,很少有文学作品站在旧城改造和拆迁的正面,客观描写棚改工作人员的不易。《家园》的新鲜之处,正在于作者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整个罗湖棚改工作现场的队伍大约有3400多人,主要有三个来源,即罗湖、龙岗两区党委政府的基层干部、罗湖“二线插花地”内原有的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以及法务服务团队,再有一个自然就是天健集团的专业服务队伍。作者从城市空间升级需要的正面

# 抓住痛点 关注民生

□李朝全

杨黎光是一位有着相当自觉的文体意识和创作追求的报告文学作家。自2003年的《瘟疫,人类的影子》聚焦“非典”的来龙去脉,开始深入的反思、开掘,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在理性追索和思辨的路上越走越远,拓展了思辨体报告文学的新天地。2007年以降,他花费了10年时间,以广东商人和广东的现代化过程为蓝本,深入探寻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印,撰写了《大国商帮》《中山路》和《横琴》“中国现代化进程三部曲”。现代化,包括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这是100多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不竭奋斗的基本目标,亦可被视为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近期发表的长篇报告文学《家园》延续了对现代化进程的探究,关注的是城市生活的一大痛点——深圳市的“二线插花地”、棚户区,亦即西方所谓的城市“贫民区”。如果说,20多年前杨黎光采访《没有家园的灵魂》关注的是人的灵魂和精神的家园的话,那么,今天他所要关注的则是那些迫切呼唤有一个宜居的家园、有居所可依的个体及个体的生活。这群生活在城市插花地的平民百姓,虽然与其他城里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但是他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相当恶劣,缺乏市政配套管网等设施,存在着重大的火灾、治安、卫生等安全隐患,堪称城市刺眼的一个伤疤或痛点。而为了改善这些棚户区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以深圳市罗湖区政府为代表的各级政府机关,可谓殚精竭虑,竭尽所能,顶着极大的艰难险阻硬着头皮上,硬着头皮搞棚改,进行清理整顿,重建新家园。

在讲述这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时,作家极力凸显棚改工程之难和阻力、压力之大。罗湖区面对的是玉龙、布心、木棉岭三个片区62万平方米9.3万人的拆迁安置工作。而如此多的地上

房产业务,涉及千头万绪的产权问题,无主地、房屋出租和管理等问题。为了顺利完成这项工程,成百上千的工作人员深入下去,网格化分片区分楼栋分解承包任务,一家一户、一个人一个人地盯紧,一栋楼一栋楼地推进,逐一进行调查、劝说、协调、安置,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完成。

为了强调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作品开篇即突出了解决棚户区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罗湖区是深圳市的中心城区,就在这个城市核心地带,却长期掩藏着这样一片疮痍落后的二线插花地区,亦即当年深圳作为与香港毗邻的边境城市分界线内的棚户区、贫民区。然而,因为改造难度太大,一直得不到整治。但是,它的确是城市和社会扎心的一个痛点,更是生活在其中的百姓的一个痛点。在倡导绿色、协调、创新、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今天,这样的插花地无疑不能再容忍其存在,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当地政府敢担当,敢作为,承担起了新时期赋予的职责,历尽艰辛完成了历史交付的重任,做出了值得铭记的贡献。

作家创作的逻辑起点是从不良生态和居住环境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落笔的。他首先讲述了几年前深圳光明新区的特大滑坡事故,这场滑坡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给深圳和罗湖区的主政者敲响了警钟:城市病灶、城市痛点、堵点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严峻地步!作家的叙事,显然是站在观照民生、关心百姓生存生活的立场上,采取了鲜明的民生视角。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城市居民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城市理应在生活更美好,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更有尊严、更体面、更安全也更舒适的生存生活环境及条件。为此,罗湖区展开了这场

伤筋动骨的城市改造。而它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在这片原先脏乱差、布满危险隐患的土地上,陆续矗立起了一片片现代化居住小区和绿地公园,建设起了全新的美好家园,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罗湖区改造二线插花地的成功实践证明,一个真心为民谋利、为民办实事的政府,一个敢作为、善作为、有作为的政府,最终一定会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衷心的拥护和爱戴,也必然会赢得民心,赢得人心。

杨黎光对棚改的叙事,还注重放在世界治理城市病的艰难历程的大背景下展开,从而使作品具有了一种国际化视野。他探讨了自西方出现现代城市以来,所不断遭遇的一个又一个城市病,以及如何应对和克服这些城市弊端,从而为深圳市的实践提供了一个蓝本和参照。深圳,这座城市诞生至今不足40年的年轻城市,正可以汲取前车之鉴,未雨而绸缪,防范于未然,自觉而主动地消灭那些城市病,消除那些城市的痛点和伤疤,从而真正让城市变得更宜居、更美好。

对这个城市涅槃重生的过程,杨黎光借用了老鹰老后如何脱胎换骨从而获得重生的过程作比。老化的鹰在30年之后,必须将它旧的喙、爪不断地打磨,使之重新变得锋利,同时换掉老旧的羽毛,方能“返老还童”,得以再生。城市亦是如此,只有不断淘汰那些落后的弊病,消除社会和个体的一个痛点,才能凤凰涅槃,得到重生和再造。

《家园》对城市管理及治理做出了自己的独到思考。如何才能让城市生活群体都得到安全,免于恐惧和贫困,免受伤害,获致幸福与满足,罗湖区和深圳市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罗湖区通过转型升级发展,实现资源最优化,打造出了一个生态、魅力、文化、时尚的新罗湖。这些尝试对于那些正在摸索如何优化城市结构、改善城市生活的地区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镜鉴和标本意义。《家园》这部思辨性特征突出的报告文学作品,对于城市治理和现代化城市建设也有着积极的现实参照价值。

# 俯仰之间探究精神底色

□王国平

记得在参加2016年报告文学排行榜评选时,给人选的杨黎光作品《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撰写推荐语,当时认为这是一部粤商发展史与演进史,展现出这个群体“海洋之子”的身份,更写出了他们海洋般的气质与胸襟。作品又并非止步于“展示”粤商,而是腾跃起来,“俯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轨迹,梳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的伟大历程,形成精神上的“仰视”。

现在,翻读杨黎光的这部《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发现作家依然顺着这个路径来处理题材。作品从城市发展史、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俯视”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进程的点点滴滴,在宏大的背景和格局下进行叙述与思考。作品立足于罗湖棚户区改造,对改造的全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与呈现,写出了这个过程的艰难与阻力,进展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以及罗湖棚改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就罗湖棚改谈罗湖棚改,并没有限于一人一地一事,而是把罗湖棚改作为一个标本进行精细解剖,再将其放置在城市发展史、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背景之下进行打量。他掌握着“思想的武器”,拥有高远的视野,将罗湖棚改的进程细细地看。有了这样的“背景”和“底气”,所以作者看得自如、从容。

同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这样的“俯视”,而是在写作过程中悄悄调换视角,目光紧紧聚焦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也就是那一句“40年特区建立之初的那股劲儿又回来了”,以及人的精神品格,也即“不讲条件,玩命干,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杨黎光对城市精神和人的精神一咏三叹,始终有着一一种精神火花在燃烧,他饱含深情地礼赞,“仰视”精神的厚重与伟岸。

在俯仰之间,杨黎光的写作思考无处不在,情感如影随形。他倡导并力行“思辨体写作”,旨在“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在追寻的过程中,他始终在思考,而且是对本源性问题的思考。他在追本溯源,力求纵深,要

往下深看一眼,往远处多看一眼,问号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间。“考据癖”诱导他得探究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罗湖的这个“罗”是怎么来的?他要寻找答案,“来源于上古越语,是壮侗语系对山的习惯称呼,带有‘罗’字的山名,是古代百越族人的语言残留”。还有“奉献”这两个平常、普通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要追问。得出的结论是“奉”,即是“捧”,意思是“给”;“献”,原意为“献祭”。“奉献”的意思是“恭敬的交付,呈献”。另外,“二线插花地”是怎么回事,木头龙这个地名是怎么回事,客人人是怎么回事……杨黎光都认真对待,毫不含糊。作品中写道,罗湖区组织各方力量,研究了800万字的法规条文。“800万字”是个什么概念?杨黎光也要停顿下来,以身说法,以自己的创作数量进行类比,形象地解释“800万字”意味着什么样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宽度。他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思考的引发点,他要在词语丛林中寻找到意义与思想的栖居地。

除了追寻这些概念式的“本”,杨黎光还不断拷问城市治理的“本”,那就是以人为本,是人与人性,是爱与尊重。他还试图发掘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本”,那就是“原生热情”,具体来说就是“发自内心的命运,让中国变得更好”。这是精神底色,是起点也是归宿。

如果说对“本”的求索是对“骨头”的捍卫,那么对丰满细节的打捞则是为了让作品更有“血肉”。杨黎光反复申明细节的重要性,“细节的缺失,意味着历史最具价值和最动人的那一部分已经缺失了”。对历史与现实进程的描述,往往是粗线条的,干脆、坚硬。杨黎光要发出一道光,照射到此间的柔软处,让他们生动起来、活跃起来,去激活读者深层次的感同身受。

杨黎光始终在行走,有脚力;他善于观察,有眼力;他勤于思考,有脑力;他在进行文学呈现上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有笔力。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也是必备的素养。